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47

2009年8月18日

\*\*\*\*\*

## 建國 60 週年感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 劉國光

### (一) 前 30 年和後 30 年

2009 年是共和國建國 60 週年。60 年來，我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對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包括前 30 年和後 30 年，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後 30 年是在前 30 年的基礎上進行的，取得成就更大一些，是理所當然的。同時，前 30 年和後 30 年也都走過曲折的道路，都有各自的失誤。這些經驗都值得我們總結，為作今後繼續前進時，需要思考的寶貴財富。

2008 年慶祝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30 週年。我們當時著重強調 30 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就，這是很必要的。由於要突出後 30 年，對前 30 年的評價，就有不同的看法，這也是不奇怪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慶祝和總結後 30 年，乘機否定

前 30 年，歪曲和抹黑黨的歷史，攻擊醜化黨的領袖。說什麼要“抹掉 1949 年以後”，要“進行歷史性清算”，“架上歷史的審判臺”，一股仇視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烏煙瘴氣。一些無良學者，假借探索歷史分期學術研究的幌子，提出中國自 1840 年鴉片戰爭以來，只有兩個劃時代的標誌性歷史事件：1911 年的辛亥革命和 1978 年的改革開放；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標誌，其否定前 30 年的險惡用心，十分明顯。另有一些同志，雖然認可共和國成立是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轉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斷代性標誌事件，但同時也把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與之並列，說它同樣開闢了一個歷史時代。這種看法表面上抬高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地位，實際上無形抹殺共和國成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標誌社會制度根本轉變的劃時代意義。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實對共和國歷史開啟了一個新的階段（改革開放階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它畢竟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總的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階段，而不是一個劃分歷史時代的斷代標誌。

以 1978 年作為斷代標誌來劃線，對比共和國的前後 30 年，往往會誤導人們的判斷。2008 年共和國成立 59 週年前夕，就有一位同志問道，“30 年前的中國是個什麼樣子？”回答是：“整個國家處於封閉半封閉的落後狀況，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一問一答，就勾銷了前 30 年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這顯然與 1981 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中對建國以來的判斷是不同的。決議中說，“32 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還是主要的”；即使遇到了文化大革命的衝擊，文件中還說，“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遇到鉅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梁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

籼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sup>1</sup>

至於中國在對外關係上，前30年是“封閉半封閉”一說，谷牧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這不符合歷史事實。<sup>2</sup> 過去毛澤東同志主張對外要“做生意”，要“實行友好合作”，要“學習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在實踐中也做了很多努力。新中國成立後20多年，我國與西方世界經濟聯繫鬆散，這不能歸因於我國政策的失誤，主要是由於西方帝國主義的封鎖。

歷史難免曲折。前30年的中國確實走過一些彎路，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主要是經濟發展和社會改造有些過急造成的失誤。如大躍進的急於求成，階級鬥爭擴大化，包括文革時期過“左”過亂的錯誤。但是這些缺點錯誤，蓋不過共和國前30年的偉大成就，包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極端落後的基礎上建立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建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能夠獨立自主地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前30年的缺點和錯誤是第二位的，成績和成就是第一位的。

同樣，後30年的中國，在取得經濟發展的飛速躍進，人民生活的總體提高，和進入世界經濟和政治重要一級的鉅大成就的同時，在社會關係上發生某些倒退，如三大差距拉開，貧富鴻溝擴大，道德水平滑坡，等等；以及在社會與自然關係上，發生資源破壞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這些社會和自然問題，黨和政府正在努力解決。這些缺陷同樣蓋不過後30年改革開放取得的鉅大成就。後30年的缺點和失誤是第二位的，後30年的偉大成就才是第一位的。

---

<sup>1</sup> 《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88、199頁。

<sup>2</sup> 谷牧：〈新中國前30年不開放是因毛澤東的失誤的看法不符合歷史的真實〉，《北京日報》2009年11月11日。

在共和國 60 週年之際，我們對前 30 年和後 30 年的輝煌成就和曲折失誤，都應抱著客觀的分析程度，決不能只用後 30 年的成就來對照前 30 年的缺失，更不能抑後 30 年而貶前 30 年。這是不公正的。共和國的 60 年，統一於社會主義。共和國給我國人民最寶貴的東西，也是社會主義。60 年前，新中國如日東旭，跨入了社會主義時代。60 年共和國經歷了前後 30 年的兩個階段。前 30 年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奠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向；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後 30 年，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繼承與發展，也是建立在前 30 年建成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的。這兩個階段的輝煌成就和曲折道路，無不與社會主義血肉相連。60 年後的共和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名義，仍然屹於世界東方。社會主義中國沒有改旗易幟，人民也決不會讓她改旗易幟，這是值得我們共和國的億萬子民欣慰和興奮的。讓我們歡呼：社會主義共和國萬歲！

## （二）從新民主主義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共和國 60 年，是怎麼走過來的？前 30 年，從新民主主義走起，走向建設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後，又從中國原有的社會主義，走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 從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

根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原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要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在一個較長時間實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等到條件成熟時，再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向社會主義

社會。

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中，又有“兩個革命階段必須銜接”，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不容橫插上某某一個階段的論述。這可以理解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一結束，社會主義革命就要開始。

實際情況的演變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取得勝利，土地改革完成後，由於農村階級分化的出現，城市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矛盾的發展，經過三年恢復時期，就提出了從建國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到 1956 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宣佈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sup>3</sup>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從 1957 年到 1978 年，繼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在曲折摸索發展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同時因為在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兩方面要求過急，也辦了許多超越階段的錯事。主要表現是追求過高過純的所有制結構和過分集中的計劃經濟，忽視了生產力不夠發達的條件下，非公經濟和市場經濟存在的必要性。換言之，沒有意識到我國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的特點。

##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過去，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等處曾經涉及。他說“社會主義分為兩個階段，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發達的社會主義”；又說，“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的發展起來，趕上和超過世界

---

<sup>3</sup> 《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 185 頁。

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時間，我看是不行的。”<sup>4</sup> 我們黨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初級階段”，是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歷史問題決議。決議中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階段”，<sup>5</sup> 就是從毛澤東上述論斷中發展出來的。

這以後，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上，鄧小平進一步根據中國國情，繼續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的傳統，第一次宣佈“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sup>6</sup> 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推向新階段。黨的第十三次政治報告，系統地闡明了“初級階段”的內涵，和由此決定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路線”，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把一個中心和兩個基本點統一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sup>7</sup>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徵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路線，在1977年黨的第十五次政治報告中，又得到全面的闡述，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報告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基本經濟制度；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sup>8</sup> 這樣，就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輪廓、框架和內涵，構畫得非常清晰。

在我們黨一系列文件中已經明確指出和闡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並在這一條道路上已經取得非凡成就多年，我

---

<sup>4</sup> 《毛澤東文集》（八），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302頁。

<sup>5</sup> 《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12頁。

<sup>6</sup> 《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60頁。

<sup>7</sup> 《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477頁。

<sup>8</sup> 《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899頁。

國意識形態界直到現在還有人把“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當做尚未解決的問題來討論。一些人在提出花樣百出的“社會主義”概念和口號，諸如“民主社會主義”、“人民社會主義”、“憲政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等。這些“社會主義”還使勁兒地往我們黨領導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裡面鑽。例如說什麼“我們這幾年實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是民主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人民社會主義”。這些所謂的“社會主義”，不提四項基本原則，無視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完全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東西。這些“主義”竟堂而皇之地在我們的公開媒體上囂鬧，說明我們黨對“自由言論”的寬容，實在是夠大度的了。

### 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否新民主主義的回歸

在中國發展道路問題上，近來又出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回歸到新民主主義”一說。認為“1949年奪取政權前，實行新民主主義成功了。奪取政權後，拋棄了新民主主義，急急忙忙搞社會主義，失敗的很慘。1978年以後重新回到新民主主義的建設思路，成功得舉世矚目”。又說“這可以用來總結共和國60年的經歷。”<sup>9</sup> 作者絲毫不懂得新民主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實質，全盤否定前30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故意抬高後30年的成功將其歸因於新民主主義的復歸。這些說法漏洞太多，這裡不擬詳析。但要注意他說的一段話：

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演變而來，而

---

<sup>9</sup> 杜導正：〈新民主主義的回歸和發展〉，《炎黃春秋》2009年第4期。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上是新民主主義的回歸和發展。<sup>10</sup>

這一段話有似是而非，混淆視聽的作用，需要明辯。

應該說，撥亂反正後，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用意，在於糾正過去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要求過急，犯了某些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失誤，如在所有制結構上要求一大二公三純等等。“改革開放”後用初級階段的名義，將這些不適合於生產力發展的做法逐漸糾正過來。初級階段理論的核心或基礎，就是公有制為主體下多種所有制並存與發展，其中允許私人資本經營的存在和發展，又是關鍵的關鍵。就這一條來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確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策是相通的。

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和建國前制定的“共同綱領”都規定了革命勝利後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包括私人資本主義在內的五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社會經濟形態，並指出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盡可能利用城鄉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改造當時是勢所必然，但是由於過急過頭，造成私人資本經營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完全消失，直到80年代初期政策鬆動以後，才逐漸恢復發展，現在又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為這一變化提供了理論前提和依據。在一定意義上，這一變化確實具有後退的性質，實行了某些類似新民主主義的政策，特別是對待私人資本的政策。但是我們不能把改革中的這一必要的後退看成是復歸新民主主義，因為改革本身的實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前30年建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進行的，不是推倒前30年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退回到建國初期曾經設想的“新民主主義社會”。

---

<sup>10</sup> 杜導正：〈新民主主義的回歸和發展〉，《炎黃春秋》2009年第4期。



## 兩個時期對非公經濟政策的差異

即使在對私人資本和非公經濟領域，新時期的政策也與過去“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情況不盡相同。要而言之，在“新民主主義時期”，根據七屆二中全會和“共同綱領”的決定，<sup>11</sup>對於私人資本經濟實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節制資本”的方針，鼓勵和扶持私人資本經營有利於國計民生經濟事業，而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由國家統一經營，還鼓勵私人資本與國家資本合作向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發展生產力，以向社會主義過度。所以當時總的經濟發展趨勢，是國民經濟中私人資本和其他非公經濟所佔比重逐漸縮小，而公有制經濟比重則逐漸增大。這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自然歸宿。

新時期對非公經濟採取的政策，與過去“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有很大的不同。要而言之，現時期的政策可以歸結為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六字方針，而沒有新民主主義時期的“限制”和“節制資本”的規定。並且，根據“國發 2005 年 3 號文件”，允許私人資本進入壟斷行業等關係國民經濟命脈領域。沒有規定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發展，而讓國有企業以股份化和私有化作為改革目標的選項。總之，新時期對非公經濟的政策，比新民主主義時期寬鬆得多，甚至有些相反。致使改革開放至今，私人資本經營不但在絕對額上飛速增長，而且在國民經濟部分所佔比重也一反新民主主義時期下降的總趨勢，而一路上躍。這種趨勢目前尚在繼續，許多人擔心這會不會影響公有制為主體的地位。這裡有改革初期非公經濟起點低的緣由，有改革以來階級形勢變化的背景，也有政策戰略和策略的考慮，等等，本

---

<sup>11</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印刷工業出版社 1997 年，第 39~41 頁。

文暫不詳論。總之，現時政策和“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有很大的不同，則是不容否定的。同時應該說，現時期對非公經濟所採取的政策，不能離開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個大前提，要時時考慮堅持社會主義的大方向。在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經濟發展中，還有“引導”二字，可以運籌。我們黨一定會根據具體條件的變化，適時地調整我們的政策，以利於非公有經濟的健康發展。所以說，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復歸，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 世界經濟危機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

隨著我國國勢的增強和加入全球化進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登上世界舞臺，作為一種模式，成為熱議的話題。各方面對中國模式有不同的解說，我個人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的核心，就是容許資本主義因素和社會主義因素的存在，但同時堅持社會主義的主體地位和發展方向。

這也是理解這次世界經濟危機中，中國的特殊表現的關鍵所在。為什麼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和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沒有捲入過去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漩渦？就是因為當時蘇聯和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沒有資本主義因素的存在，因此不受資本主義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干擾。為什麼當前世界經濟危機把中國也捲進去了，使中國發生前所未有的困難？除了過深陷入外向型經濟的原因外，主要是由於自己內部經濟隨著市場化和私有化程度的加深，使資本主義因素大量生長起來，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也發生作用的影響。為什麼中國在這次世界經濟危機中能夠表現相當不錯，應付裕如，一枝獨秀，為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所羨慕稱道？就是因為中國運用了社會主義制度中集中國家力量辦大事，以計劃導向來調控經濟

的能力。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對此作過分析，不再贅述。

有些人以中國模式中允許資本主義因素的存在，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歪稱為或者歪曲為資本主義模式，甚至說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我認為是沒有根據的。中國因為堅持了特色社會主義模式，特別是堅持了這個模式中的社會主義因素，我們才能屹立於世界經濟危機之中，處置較好。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在國家宏觀計劃導向下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用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來反對資本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以及兩極分化，把資本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限制在一定範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受資本主義經濟週期規律的干擾；保持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色！

### （三）經濟建設與階級鬥爭

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代替了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這一轉變，對近30年來引導全黨全國聚精會神集中力量搞經濟發展，推動我國經濟實力日益強大，起了鉅大的推動作用。由此在社會上也產生一種看法，認為共和國的後30年才重視經濟建設，不搞階級鬥爭，搞出了一個富強的中國。而前30年則一味只搞階級鬥爭，忽視了經濟建設，搞得中國落後封閉。這種看法不盡符合共和國歷史發展的實際。

### 對國內主要矛盾認識的分歧

任務的提出與對國內主要矛盾的認識有關。社會主義中國的

主要矛盾是什麼？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還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後，國內矛盾轉變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這是得到了全黨的共識的。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之後，對國內主要矛盾的認識，發生了一些曲折。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宣佈，國內主要矛盾已轉為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的矛盾，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由解放生產力轉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即工作重點應轉移到經濟建設。但在1957年反右鬥爭以後，根據當時的形勢，毛澤東重新提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他在1962年黨八屆十中全會上，又發展和強化了這一觀點。認為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都存在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路線的重要依據。這樣就把社會主義社會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導致了十年動亂的嚴重錯誤。

## 前30年不是只搞階級鬥爭，不重視經濟建設

儘管共和國前段發生過過分誇大和擴大階級鬥爭的曲折，但是不能認為前30年毛澤東和我們黨只著重搞階級鬥爭，而不重視經濟建設。毛澤東作為一位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熟悉生產力、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之間的辯證關係，早已提出一個政黨的先進性在於是否通過上層建築與生產關係的革新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革命戰爭時期，他十分重視根據地的經濟工作，以保證戰爭供給。接管城市之後，立即把工作中心轉向生產建設。國民經濟

恢復和向社會主義過度時期，抓對資的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和所有制的改造，也是圍繞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任務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面貌，其缺點是因求快過急，犯了主觀冒進，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錯誤。這在 20 世紀 60 年代經過調整經濟，得到糾正。儘管八屆十中全會把階級鬥爭提到空前的高度，毛澤東還是指出要分開工作問題和階級鬥爭問題，不要因為對付階級鬥爭而妨礙了工作（包括經濟工作），階級鬥爭和工作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所以雖然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但對經濟工作的影響不大，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文革十年中，提出抓革命、促生產。儘管因階級鬥爭的衝擊受到一些損失，但國民經濟只有兩年有所下降，其餘各年都是繼續增長的。並且在一些重要領域，取得比較重要的成就。1974 年第四屆人大上，周總理重申 1965 年三屆人大就已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建設兩步走的宏偉戰略設想，成為後來（包括文革以後）我國經濟建設的綱領。所以，決不應當否認前 30 年毛澤東領導下中國人民在經濟建設上的努力和成就。不然，何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何來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當然，前 30 年的經濟建設是受到了一些擴大化了的階級鬥爭的干擾，如大躍進中國民經濟的倒退，十年動亂中也受到一些損失。如果沒有這些曲折，我國經濟建設的成就還會更大。

前 30 年階級鬥爭擴大化是一個錯誤，  
但抓階級鬥爭並不錯

還要指出，毛澤東雖然晚年犯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的

錯誤，但是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鬥爭，還必須注意階級鬥爭，還是很中肯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剝削階級作為階級，當時看來已經消失，但階級鬥爭在一定範圍內繼續存在，是一個基本事實。“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是很激烈的。”<sup>12</sup> 從國際經驗看，當時的匈牙利事件，赫魯曉夫上臺，蘇共變為全民黨，等等，均預示著國際共運中隱藏險惡的形勢，為後來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的演變事實所證實。毛澤東發動文革，主觀上就是想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陰影在中國的出現。但是他在發動文革時，對國內黨內具體形勢估計錯誤，混淆了敵我是非，犯了用全國內戰、急風暴雨式的鬥爭方式，傷害了大批幹部同志。我們否定文革，是批判它作為政治運動所採取的方式方法，而不是指文革防範資本主義復辟的動機。應該說，沒有文革的預演，八、九十年代蘇東劇變會給中國帶來什麼災難，“六·四”的後果會導向何處，誰也不敢斷言。所以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說得很好，毛澤東同志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列著作，還始終認為他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須的。<sup>13</sup> 的確是這樣的。

## 1978年工作重點轉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到科學發展觀的形成

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全黨全國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是黨的八大決議的重申。八大認為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

---

<sup>12</sup> 《毛澤東著作選讀》，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85頁。

<sup>13</sup> 《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98頁。

成後，國內主要矛盾起了變化，所以主要任務也要轉移。這個決定在以後黨的歷次代表大會正式文件中並沒有改變，但是由於另一個主要矛盾即階級矛盾的重疊的結果，經濟建設這個主要任務執行得不很理想。所以文革結束後需要重提，恢復和延續。這一重申、恢復和延續極其重要。如前所述，它把全國全民的精力集中引導到經濟建設上面來，一心一意發展社會生產力，使中國取得歷史性世界性的空前進展。

工作轉移之後，“發展是硬道理”便成為我們一切工作的指針，同時出現了舉國上下追求 GDP 增長速度的片面發展傾向，這要求我們進一步轉變發展方式，實行科學發展。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其基本方法，來自於毛澤東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思想，將其發揚光大，形成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指導著我國今後的發展。

### 新時期階級、階級鬥爭還繼續存在

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工作上來以後，是不是階級、階級鬥爭就變得不重要，或者竟爾消失了呢？

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後，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觀點，也要反對階級鬥爭已經熄滅的觀點。”<sup>14</sup>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到文革結束，剝削階級作為階級確實早已消滅了，因此當時說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

---

<sup>14</sup> 《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 213 頁。

矛盾。但是，經過改革開放後 30 年的演變，中國的階級結構是否起了變化？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是否又已重視，現在光是私營企業主就比 1956 年私營工商業戶就大過許多倍，這個問題應該實事求是的判斷。即使還認為階級鬥爭現在不再是國內主要矛盾，但在我國文革後的時期階級鬥爭事實上長期存在，包括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有時還非常激烈突出，1989 年的六四事件就是例子。所以說，階級鬥爭擴大化和階級鬥爭熄滅論，都不可取，這是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講得非常明白的。

鄧小平也從不否定社會主義社會中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他對於改革開放後仍然存在階級鬥爭也是持肯定態度的。早在改革之初，他就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誇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擴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sup>15</sup> 鄧小平講的階級鬥爭限於傳統的敵對勢力和少數反動分子的破壞活動，但也包括階級鬥爭在人民內部的反映，即人民內部也有階級鬥爭的表現。這是符合毛澤東同志兩類矛盾的學說的。

十一屆六中全會和鄧小平對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論斷，為改革開放 30 年來的歷史所證明，是非常正確的。20 世紀 80 年代幾次學潮動盪，六四風波、西山會議、零八憲章等事件；以及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滲透和漫延，無一不是各派政治力量的較量，或者是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反映。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對手，有的公開地要換旗易幟，有的以潛移默化的手段達到和平演變的目的。這些驚心動魄的事實，說明階級鬥爭就在我們身邊。

---

<sup>15</sup>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182 頁。



階級和階級鬥爭主要存在於意識形態上層建築領域，  
但在經濟基礎領域也有表現

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不但存在於意識形態上層建築領域，而且在經濟基礎中也有表現。30年前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早已消滅了。改革開放後，我們承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以發展私營企業。1981年我國重新出現第一個私營企業，到2006年就發展到497.4萬戶，為1956年私營企業16萬戶的30餘倍。私營資本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無疑有很大的功績，但它具有兩面性，既有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面，也有剝削剩餘價值的一面。私人資本剝削趨利的本性，給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一系列問題。這個比建國初期民族資產階級還膨脹了幾十倍的群體，夠不夠算一個階級？“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應當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同時，按其在生產關係中所處地位，這個群體只能歸屬到資產階級。現在只講新的社會階層，不講階級。但階層分析只能補充而不能代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現在這個新資產階級雖然鄧小平不期望它再出現於中國，但畢竟出現了而且有自己的經濟訴求（如要求進入壟斷性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和政治訴求（如某些人大代表身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提出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政治主張）。這是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問題。

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是否影響到公有制為主體的地位，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和討論。公降私昇和私有化的發展趨勢，官商勾結引致腐敗叢生，等等，是使我國社會貧富差距擴大不斷加劇的主要原因。基尼係數的提高導致了居民有效消費需求的不足和生產過剩。這個現象是資本積累和貧富分化規律帶來的後果，而與社會主義主要矛盾即人民需要與落後生產的矛盾所講

的道理也不相符合。

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和經濟基礎領域的上述種種問題，都與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存在有關。我們不能視而不見，淡化置之，走向階級鬥爭熄滅論。美國原駐蘇大使馬特洛克在《蘇聯解體親歷記》一書中，說到前蘇聯領導人拋棄階級鬥爭學說時，指出“須要出現轉變，其中最重要的莫如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拋棄了這個觀點，那麼，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們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如果我們淡化階級觀念，走向階級鬥爭熄滅論，這樣發展下去，有走蘇東覆轍的危險。所以在重點抓經濟工作，抓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同時，必須像毛澤東同志教導的，要不忘階級和階級鬥爭。當然同時要正確處理階級鬥爭中的兩類不同的矛盾，求得人民內部的和諧，團結起來爭取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

#### （四）也談“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的。鄧小平將“改革”和“開放”合起來，作為現階段中國的國策，開創了中國大踏步前進的新時期，這是他的偉大功績。但細考“改革開放”四字詞組，並非出自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而是有一個形成的過程。

#### 1978年後改革開放四字方針的形成

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涉及“改革”和“開放”的文字，見於

以下兩句敘述：“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式著手認真的改革”，和“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sup>16</sup> 其中有“改革”的字樣，也講到“對外經濟合作”；都屬於一般工作方針的敘述，並不處於文件的中心地位，文件沒有出現“改革開放”的概括。當時還贊成人民公社體制，沒有提出要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到1982年第二個一號文件才明確提出這一項改革任務。

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鄧小平第一次發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號召。<sup>17</sup> 這次會議的政治報告在講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時，也沒有提到“改革開放”。但指出1981年到1985年第六個五年計劃任務時，要堅決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把改革任務與調整，整頓和提高並列。<sup>18</sup> 這次報告中提到“改革”字樣有十多處，包括經濟管理體制、價格、勞動工資制度等改革，還提出了改革國家政治體制和領導體制等等。報告中三次提到“對外開放”，並且把“實行對外開放”提到“我國堅定不移的戰略方針”的高度。十二大文件沒有把“改革”和“開放”兩詞作為一個完整的方針並到一起。這兩個詞配搭組合放在一起，直到1987年十三大報告中才出現。

十三大報告是在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路線時，將“改革開放”作為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一提出來的。這個詞組在報告中多次頻繁出現，成為正式的政治術語。報告稱“堅持改革開放的總方針，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的新發展”。以後我們就沿用了這個提法。

---

<sup>16</sup> 《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6頁。

<sup>17</sup> 《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60頁。

<sup>18</sup> 《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68頁。

任何正確的理論和政策，都有一個探索和形成的過程。“改革開放”也不例外。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確實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但是“改革開放”作為一整套理論政策方針，也確實需要一段醞釀的時間。這從“改革開放”詞語運用的演變上也可以看得出來。“改革開放”逐漸成為我國社會經濟政治生活中統治的話語，成為支配人們行為活動的指針，是經過了一個過程才形成的。

### 1978 年前 30 年也有改革開放

以上說的是 1978 年以後改革開放方針的形成過程。應該說，改革開放的名義和實踐，不是 1978 年以後才有的東西。何以見得？拿“改革”來說，這個概念早已有之。遠的不說，在 1919 年湘江評論上，時年 29 歲的青年毛澤東就意氣風發地一口氣提出政治、經濟、教育、社會、思想等八個方面的“改革”。<sup>19</sup>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把“改革”與“革命”等量齊觀，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義的改革”。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1957 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寫了一段經典性的話：“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但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是與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之外，還有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我們今後必須根據新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矛盾。”<sup>20</sup> 這裡講的解決矛盾的方法，就是“改革”。

我們知道，“改革開放”後，第一個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

---

<sup>19</sup> 《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第 292~293 頁。

<sup>20</sup>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 768~769 頁。

定（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對於經濟體制改革所做的經典定義，就是：“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繫的環節和方面。”<sup>21</sup> 這一改革定義的內涵精華，就出於毛澤東1956年的上述論斷。

按照毛澤東的論述，以完善社會主義為目標，以解決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為內容的“改革”，其實在20世紀50年代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就已經開始了。實事求是地說，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不同於蘇聯做法而適合於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張，在制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時提出的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以後60年代肯定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等等，都具有改革的性質。實際上，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是一個共同始終的過程。共和國的前30年，在一定的意義上也是改革的30年。

再拿對外開放來說，谷牧同志在一篇文章中，闡述毛澤東在建立新中國後對外經濟關係的基本構想，是“要做生意”，要“實行友好合作”，要“學習對我們有用的東西”。<sup>22</sup> 在實踐中他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封鎖，不准我們開放。毛澤東從來沒有閉關鎖國的念頭。所以說，“改革開放打破了以前的僵化封閉”之說，現在看來是不公正的。

## 新時期將改革開放作為長期國策

說改革開放只是在共和國的後30年才有，並不符合事實。不

---

<sup>21</sup> 《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347頁。

<sup>22</sup> 谷牧：〈新中國前30年不開放是因毛澤東的失誤的看法不符合歷史的真實〉，《北京日報》2009年11月11日。

過應該承認，後30年我們把改革開放逐漸突出起來作為長期國策，把它列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路線的兩個互相配套的基本點之一，對中國的發展確實起了鉅大的推動作用。黨的十七大指出《改革開放》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sup>23</sup> 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與另一個四項基本原則結合在一起，改革開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

為什麼說改革的方向總是正確的？因為從根本上說，改革就是不斷調整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使之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種意義的改革，如前所述，毛澤東早已大力提倡，在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整個歷史階段，改革都將是永久的使命和常態的存在。

但是改革還有一種含義，就是作為階段性的國策，改革要實現某種制度、體制，或者模式的轉換。比如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單一的公有制體制轉變為多種所有制並存的結構；以及從更廣闊的意義上向建立初步現代化中國的轉變等等。一旦這種階段性轉換目標基本完成，作為階段性國策的改革，就要納入不斷調整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以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發展這一永久性的常態的進步過程。

目前我們黨提出的改革任務，應該說具有階段性國策的含義。按照鄧小平的思路，包括改革開放在內的基本路線所管的時間，從20世紀中葉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算起，到21世紀中葉初步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任務，大約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時間。21世紀中葉初步完成現代化建設任務後，改革開放這一階段性國策就可以轉為繼續調整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各項政策。但在21世紀中葉前的若干年內，改革開放的總政策必須堅持，

---

<sup>23</sup> 《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選編》（下），第1716頁。

“動搖不得”。<sup>24</sup>

## 正確掌握不同領域的改革進程

改革開放在今後相當一段時期不得動搖，是就改革開放作為總體來說的。但改革開放涉及領域甚廣，內容浩繁，進度不一，有些方面進行得比較順利，有些方面比較複雜。順利的改革有的已經成功，轉入完善的階段。比較複雜的或者啟動較晚的領域，則需要把改革堅持下去，爭取最後的勝利。

比如，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換。目前在全部商品流通總額中，市場調節的部分，已佔 90% 以上；前幾年的估計，我國市場經濟在整體上完成程度已達 70% 左右。所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我國已經初步建立。是否可以說，高度集中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換的改革已經基本完成。當然現在還有少數領域，市場化改革有不到位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領域發生了過度市場化的毛病。這些不足和過頭都需要繼續調整完善，但已經不屬於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大轉換的主流。今後按照十七大精神，要加強國家宏觀計劃對市場經濟的導向調控，<sup>25</sup> 如鄧小平說的“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sup>26</sup> 都要發揮它們在經濟中的調節作用，而不再提不帶限制詞的“市場化改革”。

又比如，所有制結構從單一公有制經濟轉變為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改革。現在，非公有制經濟蓬勃發展，大大超過建

---

<sup>24</sup> 《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 633 頁。

<sup>25</sup> 《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獻選編》，（下）第 1726 頁。

<sup>26</sup> 《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 635 頁。

國初期。並且，公有制經濟與非公經濟的公降私昇的趨勢，已影響到公有制為主體的臨界點。所有制結構改革的任務，可以說已經基本勝利完成。今後的任務，應該是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要強化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方向，並且正確引導非公經濟的發展。

再比如，從有大鍋飯和平均主義傾向的分配制度，轉向到效率優先拉開差距的改革，現在明顯早已勝利成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早已超期超額完成。按鄧小平的預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階段，應在 20 世紀末 21 世紀初結束，轉向“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方向。<sup>27</sup> 由於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已將此項轉變推遲。看來要抓緊研究這個問題，從根本上端正分配問題的改革方向，以解決鄧小平臨終遺言諄諄關矚“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sup>28</sup>

再比如，農村改革從人民公社體制改為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早已成功，特別是以分為主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責任制，得到事實上的推廣。這是鄧小平講的農村改革的“第一個飛躍”。經過 30 年的演變，農村經濟已獲得鉅大發展，現在是不是應該轉為著重解決雙重經營責任制的“統”的一面，發展新的農村集體經濟，這是鄧小平講的農村改革的“第二個飛躍”。這是保證農村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必由之路。在“第一個飛躍”階段的改革勝利結束以後，應該認真考慮農村下一個階段的“第二個飛躍”了。<sup>29</sup>

---

<sup>27</sup> 《改革開放 30 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 635 頁。

<sup>28</sup> 《鄧小平年譜》（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年，第 1364 頁。

<sup>29</sup> 關於農村“兩個飛躍”的思想，見《鄧小平年譜》（下），第 1310~1311 和 1349~1350 頁。